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

陈平原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

陈平原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/陈平原编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8.8

(文学史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9564-9

I. ①文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文学史研究 IV. ①H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16692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
WENXUESHI DE SHUXIE YU JIAOXUE |
| 著作责任者 | 陈平原 编 |
| 责任编辑 | 艾 英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9564-9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电子信箱 | pkuwsz@126.com |
| 电 话 |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6672 编辑部 62756467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0.375 印张 227 千字 |
| |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49.00 元 |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中国学界之选择“文学史”而不是“文苑传”或“诗文评”，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，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。从文学观念的转变、文类位置的偏移，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，“文学史”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。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，“文学史”在20世纪的中国，产量之高，传播之广，蔚为奇观。

从晚清学制改革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展开，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，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：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（1904）还只是首开纪录，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，如姚永朴的《文学研究法》、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和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、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吴梅的《词余讲义》（后改为《曲学通论》）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和《白话文学史》、周作人的《欧洲文学史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以及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辨》、游

国恩的《楚辞概论》等。这些著作,思路不一,体式各异,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。

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,并无“唯我独尊”的妄想,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;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,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。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,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,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,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。

在很长时间里,人们习惯于将“文学史研究”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(或教材式的“文学通史”),其实,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,尽可不必画地为牢。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,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,也都各具面目,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。

那是一个“开天辟地”的时代,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,但生气淋漓,至今令人神往。鲁迅撰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序言》,劈头就是: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。”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:“有之,自鲁迅先生始。”当初的处女地,如今已“人满为患”,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?胡适撰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,以历史眼光、系统整理、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,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。今日中国学界,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,早就超越胡适的“三原则”,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?

当初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人“整理国故”时之所以慷慨激昂,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。今日中国,能否有此迹象,

不敢过于自信,但“新世纪”的诱惑依然存在。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,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。

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,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,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。在 20 世纪中国,相对于传统文论,“文学史”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。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,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,如何洗心革面、奋发有为,值得认真反省。

反省之后呢?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——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。

1999 年 2 月 8 日于西三旗

小 引

陈平原

在专业化大潮浩浩荡荡的当下,选择十次学术对话结集成书,当然是别有襟怀。对话者大都是文学研究专家,对话又基本上围绕“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”展开,故以此为书名。参加对话的,有美国学者、日本学者,但仍以中国学者为主;大部分对话现场是北大五院,自然以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声音最大。仅在我主持且有现成文本这一范围内选择,可想而知,论述的广度及深度大受限制。或许更重要的是,“对话录”这一文体本身,决定了其必定是随意挥洒、生气淋漓,但不成体系。

三十年前,钱理群、黄子平和我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影响很大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》,当时就有高人讥之为“鸡零狗碎”。其实,作为思想草稿的学术对话,本来就是这个样子,若有条不紊,严丝合缝,反而显得可疑。这一文体的规定性,导致其更倾向于众声喧哗,各说各的话,且都点到为止,无法深入展开,与专业化时代“窄而深”的主导风气格格不入,因而被很多学术杂志拒之门外。

作为专业研究者,平日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,与同道对话多

多,但不见得都形诸文字。大部分声音随风飘逝,偶尔因报纸或杂志需要,方才根据录音整理成文。某种意义上,是发表园地制约着整理者的思路与笔墨。比如,报纸篇幅限制,只能是摘录,钱理群《岁月沧桑》出版座谈会上,陈徒手、贺照田、耿化敏等人的精彩发言就没有保留下来(还有孔庆东的书面发言);相对来说,收入《现代中国》的五篇近乎有闻必录(连带笑声),琐琐碎碎,更能体现现场的氛围。

这就说到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《现代中国》集刊,前五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,第六至十五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。第六辑(2005年12月)专门设立“对话”专栏,且在“编后”中称:“在正襟危坐的论文之外,建立‘对话’栏目,容纳若干很有见地但未必符合学院派脾性的‘言谈’,也算是有张有弛,相得益彰。作为文体的答问、对话、座谈、演讲等,不可能像专业论文那样精雕细刻,但其‘逸笔草草’,也自有其特殊魅力。”第九辑(2007年7月)的“编后”则言及:“作为研究集刊,《现代中国》一直标榜民间性及学术性,因此,刊发高水平的专业论文,是其主要职责。但这回有点特殊,我更想推荐给读者的,是一场学术对话。那就是本辑殿后的《海外中国学的视野》——几位主讲人的意见固然值得参考,更重要的是同学们的提问,因其蕴涵着年轻一代学人的困惑与求索。”第十三辑目录(2010年11月)更是将四则对话与笔谈放在开篇,理由是:“将‘对话’这一很不严谨但以视野开阔见长的专栏,提到最前面,也算是别具一格。学问内容千差万别,表现形式更是五彩缤纷,若以为只有注释20个以上(此乃香港某教授的规定)且进入‘核心期刊’的,才值得认真对待,那就更大错特错了。”

除了自家主编的《现代中国》，还幸亏有《上海文学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明报》（香港）、《学术月刊》《北京青年报》鼎力相助。此外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》虽中文本在先，日译本在后，但此次“鼎谈”的发起者是代表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《中国21》编辑部的黄英哲教授。

诸多著名学者参与对话，贡献了许多精彩的思考及判断，这点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大都会留意。容易被忽略的，是以下文字整理者（依各文顺序排列）：杜玲玲、汤莉、彭春凌、张春田、倪咏娟、陈艳、许诺、杨琼、刘紫云、黄念欣、陈子谦、陈伟华、张丽华、滨田麻矢、小笠原淳、王勉。这些当年的研究生或年轻教师，如今大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卓有成就。虽然文稿最终经过发言者本人的校订，但最初的整理工作相当辛苦；值此结集之际，也向各位文稿整理者致谢。

除了“文学史”这一共同话题，读者或许会注意到，全书起讫之间，有某种精神上的呼应。从1993年的“彷徨无地”，到2016年的“拼命写作”，虽有记录及发表的偶然性，但历史舞台上一代人的生存空间与表演姿态，借此得以呈现，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。

2017年1月31日（大年初四）

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目 录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·····	陈平原 /1
小 引·····	陈平原 /1
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·····	1
“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”与日中文化交流·····	18
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·····	36
海外中国学的视野·····	69
想象中国的方法·····	129
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·····	175
都市研究·香港文化·大众传媒 ——陈平原、陈国球、李欧梵三人谈·····	210
“跨媒介”如何对话·····	221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·····	278
“拼命写,直到写出我想写的一切”·····	307

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

时 间:1993 年 4 月 30 日

地 点:北京大学蔚秀园

主持人:陈平原

对话嘉宾:钱理群、吴福辉、赵园、陈平原

文字整理:杜玲玲

陈平原:去年以来,面对迅速崛起的商品经济大潮,最难适应的可能是人文学者。相对来说,自然科学家因有可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变成专利用以开发,故转型比较容易;学经济的、学法律的,也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摊子,也比较容易转型;跟整个市场经济距离最大的,或者说将来最难立足的,可能是人文学者。把论题限定为“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”,目的是想撇开那些关于“下海不下海”之类的争论。就谈“现在时”的人文学者,“前学者”不算;不考虑那些以前做文史研究,而现在已经从政或下海的朋友。因为我觉得那是另外一条路子,如果要涉及诸如“要不要下海”“从不从政”,问题就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考虑的,是还愿意在书斋里面做文史哲研究的这些学者们的命运,以及将来可能的出路。谈“命运”是对现状的估计,谈“出路”或“选

择”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预测性。我们可以谈学界的现状,也谈自己的选择,随便谈就行了。

当初拟定这个题目,是因为我特别注重人文学者的转化,也就是人文学者的重新定位的问题。从历史上考察,晚清以下,中国的读书人已经从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专业的学者,相对来说,转化得比较成功的是搞自然科学的,因为其学术背景基本上就是西方的。人文学者受中国传统士大夫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那一套价值观念影响比较深,容易有“经世致用”的愿望。再说,几十年来,人文学者在整个社会动荡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,因此还依然保持着所谓“经天纬地”的人格理想。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地都还遗留那一种东西,跟宋元明清的读书人还有很多血脉的联系。自然科学的学者比较容易转过弯来,变成学有所长的“专家”。而由于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缘故,关注的是精神、价值、观念等等。这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:以为我们仍然还控制着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,仍然还能对民众发号施令,仍然还在启蒙,仍然还在维持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和道德。这样,人文学者向真正意义上的“专家”的转化就比较慢。这两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,好多读书人走出了书斋。我猜想同样说“下海”,搞自然科学的(从事基础研究的除外)、搞社会科学的,心理障碍都没有我们那样大。如今搞人文科学的人同样面临这个“转轨”的时代,普遍感觉问题比较严重,疑惑较多。这跟我们以前对自己的估价——我认为不甚合适的估价——有点关系。所以我说“重新定位”——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?我们还能做些什么?

钱理群:人文学者的地位由中心位置向边缘位置转移,恐怕

是跟整个中国走的历史道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有关。从“五四”以来,甚至可以说20世纪以来,中国一直走着一条首先通过“思想革命”,制造舆论,启发和动员群众,然后发动“政治革命”,以图中国社会根本变革的道路。1949年以来,更是长期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大,文学艺术、人文学科也因此被视为“晴雨表”而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。这种人为的“中心地位”在中国知识分子,特别是中国作家、人文学者中造成了可悲的幻觉,仿佛我们自身也真的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主体。这种“自我神化”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失去了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真实性的体味,我们不能(不愿,也不敢)正视:这种所谓“中心”位置,是以我们自身的被“改造”、扭曲,以屈从于权力意志、大众意志与时代意志为代价的。现在,历史的发展又对我们开了一个玩笑:20世纪末的中国,一改走了大半世纪的老路,走上了“经济兴国”的新轨道,而且看来不可逆转。这样,人文学者地位的边缘化,就不是商品经济一时的冲击的结果,而是一个历史的新选择所形成的发展趋势,因此,我们必须有一个长期(甚至永远)“坐冷板凳”的精神准备。在我看来,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它至少从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,使得我们有可能从自命为“时代的主宰”的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、浪漫主义的幻觉中惊醒过来,正视我们现实的生存境遇、实际地位,弄清楚我们能够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,并且能够做到什么程度,发挥多大作用,这样,就能够获得一种清醒的、比较符合实际的自我体认与自我评价。现在,有的人仍然念念不忘当年处于“中心位置”的“雄风”,今昔对比,不胜感慨之至;其实,当年的“雄风”并不值得羡慕,我们千万不要再陷入鲁迅所说的“想做

奴隶而不得”的“悲哀”里去。

陈平原：不过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恐怕也并非始终处在奴隶状态。我曾经把这一百年中国的学术（以及相应的学者地位）分成三个阶段：从世纪初到1940年代大概是个体学术阶段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是计划学术阶段，从1980年代末到现在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可能是市场学术阶段。一二十年代（1940年代因处于战争状态，不太典型了），大学教授们的待遇比较优厚，可以凭他们的兴趣、凭他们的良心、凭他们对学科发展方向的理解来做他们愿意做的研究工作。那时候既没有一个国家规划，也没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经济压力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学者们自作主张、随心所欲。从1950年代开始，知识分子的生活由国家“包”起来了，一直到1980年代，都是一方面“被养”，另一方面就被要求“服务”。国家规定你的学术研究方向，规定你的学术选题，甚至规定你学术研究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，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划从事你的研究工作。1990年代以后——其实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，从“丛书热”开始——学术界出现一种新动向，借用经济学术语，是“订货”与“供货”。以后我们从事写作不是因为自己的学术冲动，也不是国家下达科研任务，而是有了出版社的“订货单”。“订货”的前提是假设“学术”可以而且已经进入市场，或者说读者需要什么我们就该写作什么。以后可能会形成这么一种格局，在这种格局下，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读者以及代表读者需求的市场。假如真的这样，相对来说好处可能是思考的自由度大了，不一定直接受制于哪一个政府官员或者哪一条临时政策；不好的地方是，我们被另一只手控制了，即被以经济效益为代表的市场这一只手控制了，或者说，我

们的学术研究将被读者的趣味所左右了。所以说以后所面临的问题,与前面时代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。

赵 园:我同意平原的这种说法。近几年的商业化,影响于学术文化,是几百年未有之变局,或许不止“几百年”。但对此可以从多方面估价。比如,是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,即如所谓“纯学术”(当然,“纯学术”这名目本身可以讨论)。既然有一些人在搞他们自以为的“纯学术”,正是利用了经济进程所提供的自由度。这名目在十几年前是犯忌的。

我相信在这种情势下,继续从事文史研究者,他们彼此之间会更清晰地区分开来,所谓学术分途、文化分流,有更专业化的研究,也有跟时务较接近的研究……

钱理群:你说的“时务”指什么?

赵 园:就是跟现实比较贴近。

陈平原:就是咱们说的“文化批评”。

赵 园:以及较为通俗化的,适应更为大众的文化需求的研究。我想,倒是在这种情况下,平原常说的学者的“职业化”“专业化”,才成为可能。商业化会“澄清”,使诸种选择间的区分更显明;商业化还会“淘汰”,不只使有些应当生存的学科、学术门类面临困境,也会淘汰那些无对象的、既不适于学术尺度也不适于一般价值尺度衡量的、几乎不适应任何社会需求的所谓“学术”。文化市场会为自己造就人才,除写作庸俗出版物、适应不良趣味的人才外,也会造就用较通俗的方式普及学术文化的人才。这种人才不是新的,自晚清新闻出版业发展以来,文化市场就大量地造就过这种人才。而且我注意到,二三十年代,文人并不严守雅、俗分际,仍有中国文人传统的那种通脱。对于文化市

场需求的适应,也是一种生存努力。现代史上的文人,卖文、靠版税为生、靠报章文字生活的,就不乏其人。我在日本的书店里看到的,大量的还是较通俗的学术出版物……

陈平原:日本学者似乎特别欣赏中野美代子的研究?

赵园:对。当然,“分途”与“淘汰”都不会轻松,可能很严酷。这一过程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都会有。不可能指望“市场”去维持“专家之学”。当然,对“专家之学”也仍不妨作不同估价。顾炎武、王夫之对汉代的专家之学评价就不同。“市场”并不公正,不可能鼓励学术上的公平竞争,但可能有助于摆脱某种依附。长期以来,“养起来”不但制造平庸,也使文人丧失了某些本有的生存能力。我明白市场、钱是一种权力,但全无所待是不可想象的。对于中国的文人,多一点选择余地没什么不好。不要危言耸听,谈论这类问题不要过分地道德化……

陈平原:“危言耸听”本身也可能就是商业行为。

赵园:对。对于文化,市场是一种破坏性的,也是建设性的力量,尤其现在。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,又在长期的禁锢之后,市场的文化品味之低是不奇怪的。市场的文化水准也有待提高。这需要过程,这一过程也须有文人的参与。

我这里说“文人”,而没有用平原的提法,因为我在研究机构,生活与工作方式更近于传统文人。我觉得“文人”这角色就很值得作批判性的审视。顾炎武一再引宋刘挚的话,“士当以器识为先,一命为文人,无足观矣”。鲁迅也好引这段话。明清之际,到近现代,关于文人的批评很多,其中有些批评包含了自嘲。我感到几十年来,文人自身在退化,文化素质、精神品质都有退化。而由清末到近代,尤其19世纪、20世纪之交,文人这

一传统角色是经历了改造的(包括他们的生存方式、写作行为等等),因而才有可能出现鲁迅那一批有独立的批判态度的文人。

半饥半饱地被养起来,造成了对权力、对豢养的依赖,使文人丧失了曾经有过的独立地位(当然,这种说法将问题简化了,实际的因果要复杂得多)。

钱理群:我仍然相信鲁迅的判断:中国文人(大部分现代文人恐怕也包括在内)不过是“官”的“帮忙”与“帮闲”(其等而下之者就是“扯淡”了),以后又成了“大众”的“帮忙”与“帮闲”。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变动本身,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人的历史困境,甚至还会造成新的陷阱和危机。例如,在新的社会格局中,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权力的依附,却同时增加了成为“商人”的“帮忙”“帮闲”与“大众”的“帮忙”“帮闲”的危险。

赵 园:商业化、经济冲击、文人的相对贫困化,在一段时间里(恐怕这段时间会相当长)还会造成人才的流失、精神产品文化品味的普遍下降。在这期间,“文人”这名目将更像是讽刺。我们自己就在这困境中。1989年以来,我个人就一再遇到学术著作出版上的困难。解决这些问题,大约只能用不少国家的模式,由一些基金会提供资助;尤其由企业界提供较少附加条件、较少学术限制的研究基金。企业界与文化界已开始建立某种联系,我对此持乐观态度。如前面说过的,至少在目前,多一条生路没有什么不好。

我个人是要继续搞学术的,在这方面也依旧文人习气,考虑的并非社会需求,而是个人的精神满足。但至少在理论上,我认